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牧民與「動物生命」

Pastorat et "la vie bête"

doi:10.6752/JCS.201006_(11).0008

文化研究, (11), 2010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1), 2010

作者/Author : Alain Brossat;羅惠珍(Hui-Chen Lo)

頁數/Page : 116-124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2010/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006_\(11\).0008](http://dx.doi.org/10.6752/JCS.201006_(11).0008)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牧民與「動物生命」

Pastorat et “la vie bête”

Alain Brossat

羅惠珍翻譯

Hui-Chen Lo

本文一開始就是個詭異，當傅柯(Michel Foucault)將牧民權力定義為如同一個龐大型態時（可參考〈集體中的個別性〉〔*Omnes et singulatim: Towards a Criticism of Political Reason*, 1979〕¹、《規訓與懲罰》〔*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 prison*, 1975〕……），他總是專注且深入到基督教牧民的細節問題裡層，而不是從最初的牧民型態，亦即從牧民者的觀點、行動、引導行動的動機與原則出發（以顯現出他雙重尺度的「倫理」，他的主體性或可作為權力運作並完成主體化的各種樣態），傅柯的牧民研究從來不是關注母羊群(brebis)這樣的牧民對象與關係。羊群，母羊群是持續且唯一被視為牧羊者管理所關懷的純正單一對象。換句話說，文學上是動物的形象：作為「被統治」的要素或有目的性的引導，羊群不會說話，一群群的母羊之間並沒有互動的能力，牧羊人的行動只是為了很單純與正當的理由。羊群的境況停留在動物性的領域——一切宛如是在原始或最初的牧民權力中進行，由於沒有任何形式的主體，沒有任何語言的管道，沒有任何發展違抗管理的能力出現在「羊群」這一邊，人們形同動物一般的被統治。我們甚至可以問，根據傅柯的牧民論述，牧民的關係是否就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母羊群是「被管理的」，甚至超越了被管

1 Michel Foucault, “Omnes et Singulatim: Toward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Reason,” 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 delivered at Stanford University, October 10 and 16, 1979.

airiti

理的程度，源於傅柯經常提出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無論屬於何種形貌，他假設其間的互動與組成權力運行時某些必要的「使之作為」——一方面安排部署一些管理，另一方面，則是違抗管理、抵抗、論說、行動等，展現出在被統治者一方存在著真正的「反對陣營」。

我在此綜合傅柯闡述牧民權力的基礎與原則：起初，牧師是上帝與人們之間的聯繫，是一個非常古老的結構，我們可以在亞述人(Assyrians)、埃及人(Egyptians)、希伯來人(Hebrews)社會中找到，而非在古典希臘社會裡。傅柯說，在這些文明中，上帝與祂的子民關係之定義，如同牧羊人與羊群的關係。將這個上帝與子民關係的牧民結構對換轉置在人類的導師——牧民者——與人群關係中，成爲一種權力模式。

傅柯針對這種權力型態的特徵強調：這種權力型態既非鎮壓的，也非威權的，牧羊人不攝政，角色如同在一塊領土或城邦裡的希臘國王，牧羊人引導帶領著羊群，時刻保持警戒，看守羊群，不讓牠們誤入歧途或虛弱衰弱。這是一種照護的權力：牧羊人不「爲他自己」而統治，恰恰相反，完全是「爲了他人」。羊群與屬於這種模式的權力型態，不僅是總體，同時也是個體的：他的所有照料是爲了羊群。但根據那本非常著名的聖經之想像，牧羊人謹慎地看管著每隻動物，不讓他們走錯路，也不能讓他們身體衰弱，有時甚至爲了尋回拯救一隻迷途的羔羊，牧羊人得暫時置其他羊群於不顧。

傅柯對牧民最初型態的所有延伸，都致力於那個我們可以稱之爲牧羊人工作手冊的描繪。羊群並沒有自己的存在：牠們「以牧民者的直接行動與立即出現而存在。」²

2 引自〈集體中的個別性〉。無論在〈集體中的個別性〉或《規訓與懲罰》這兩個文本中，傅柯對這個龐大權力型態在其最初形式所作的全部描繪，完完全全著力於牧民者的形貌——他，就像個嚮導，帶領著他的羊群，保障羊群的安全，奉行恆常且個體化的仁慈照顧，理解到羊群既是**集合的也是細部的**。傅柯同時也堅持這個型態所呈現的嶄新面貌，他說：「歐洲大陸這一方，在古典時代末期所出現的社會裡，曾創造許多不同的政治樣態……，而這些政治樣態僅僅發展出一種奇特的權力對待之技術，絕大多數的人們是成群的，而牧者卻僅僅是少數人。」。

針對這第一部分的牧民權力闡述，是我的第二個詫異。

首先，和某些常識相反，傅柯在這兩個文本中，對牧民權力作了頗多堅持——具有個性的特點——個體的照護權力，同樣令人驚訝的則是，「個別母羊」真正的個體性全然沒有被考慮到。這個承擔與奉獻，如何能在沒有交流之下展現呢？牧羊人與母羊的個別性又將如何產生互動呢？迷途羔羊、病弱綿羊、桀傲不馴的母羊與牧羊人之間又如何建立關係？缺乏語言，這個關係又如何能維持呢？牧者使羊群具有個性的「遊戲」，是否會局限在辨識身體上有特殊「問題」、行徑不規矩的母羊呢？不建立一種特定的關係，又怎麼處理這個問題呢？關於這些，都未見於傅柯的文本中。

其次，只要打開聖經（傅柯在這些文本中經常參考聖經），已明確地意識到「人群」有一個固有的「存在」，一種將自己表現出來的能力。因具備了這種能力，因此可將聖經中的羊群定義為牧者照護的純粹對象。當然，如果我們拿《出埃及記》(*Exode*)為例的話，就會有問題：首先，希伯來人作為子民與上帝的垂直關係，摩西(Moses)自認在這段旅程中，他是被指派扮演上帝子民的委託人、中間人。如此可怕角色啊。

傅柯所提出的「牧民結構」就在此，希伯來人的上帝妥善引導祂的子民們穿越沙漠，經常可看見祂現身顯靈，祂引導、展現、保證、並鼓勵勸勉祂的羊群們……，但是，和傅柯分析的例子相反，羊群也是人群：它同時顯現出最好與最壞的部分，集體的部署(*dispositifs*)，有自己的運動(*mouvement*)，這些運動經常違反他們的上帝之指示，而這個上帝則一絲不苟地透過摩西傳達指令。在逃出埃及的漫長旅途中，這群子民們經常發言表達他們的氣餒、憤怒、不耐、失望、挫折。他們抗議由摩西所傳遞的指令，他們懷疑、漂泊並遠離指揮。在希伯來人所崇拜的著名的《金犢偶像》(*le Veau d'or*)篇章中，可見端倪。

因而，在此出現了牧民的型態，其原始型態並非與一個被定義為活生生的且被賦與真正主體性的群體不相容——法老的奴隸們，希伯來人形成黑暗人群的集合體，尚未鞏固他們與上帝的聖約，上帝將會

讓他們得到基督精髓——但他們並未縮減到相當於啞口與不知懺悔的動物性，他們是走入歧途且遭受虐待的子民，他們是人類。而他們的存在不能被壓縮到摩西任務對他們的界定：作為上帝的子民。

傅柯在〈集體中的個別性〉文本中精細地分析柏拉圖的《論政治》(*Politique*)，用以呈現牧民權力的型態基本上相異於古代希臘思想——這應該是柏拉圖在《論政治》對話錄之思想呈現，他並隨時化解牧羊人與統治人類的牧民者之型態，以增強織布工的形象。傅柯提醒，柏拉圖的論據並非區分動物管理與人群管理，使我們易於定義在城邦中所行使的權力型態——對柏拉圖而言，這並非在決定哪些種類可以形成群體，而是在分析**牧羊人的作為**(*ce que fait le berger*)，傅柯強調，我們可以說，國王，是或不是，某一種類的牧民者。

傅柯凸顯了有關主體存在以及人類或動物群體部署上的「絕境」，這個識別顯得不甚重要，如此分析牧民型態最初的形式，是**完全且毫無保留**地集中在牧羊人的角色與功能，彷彿這個權力型態在主體與客體（活人，*vivant*）單邊關係中，行使在全然不對稱、不均衡的模式上。當然，這個型態在普遍條件下會代表著一種很顯著的例外，例如傅柯在《知識的意志》(*La Volonté de savoir*, 1976)所提出的權力之解析，其重點經常被置於被統治者的自由與他們獲取權力的能力，用以產生各種形式的對抗權力。然而在我們所研究的傅柯文本中，這個論點並無出現任何答案。

《論政治》一書中，牧民權力被清楚定義。傅柯說：牧羊人負完全責任的權力，他是羊群唯一的領導人，照護這個群體的生命——他細心供給食物、照護健康、指導統帥、協助再生產、讓他們得到消遣休閒，而且是……一種完全的生命政治，當然是在這個字彙形成之前。然而柏拉圖堅持，在希臘城邦中多種功能並非單獨歸屬於一個人（無論我們所定義——國王、政治人物等），而是許多的主體——醫生、麵包師傅、農夫、樂師等等。政治人物的任務並不是以牧民的角色承擔所有維修、供養的功能，而是結合多元的性格，集結人們「在友誼與和諧基礎上，形成一個社群」，如一塊由不同顏色與材質所織成的布。非上帝也非牧羊人，政治人物負有保證城邦大一統的責任。

對傅柯而言，真正有趣的是，作為一個立基在承擔總體與群體生命各個面向的牧民者，似乎永遠不會比一個至高能力、深思熟慮的牧羊人——也就是他所謂的上帝——承擔更多的事物。傅柯說，因希臘城邦其人口眾多且由數人領導，所以希臘城邦排除了上述形式。即使把假設的牧民者從東方空間轉換至最傑出的歐洲地表與政治空間——城邦——有關群體的主體性問題也未被提出。或者，該如何想像如此多重領導的人群統治者之可能性？如果人群絲毫沒有參與，或沒有另一種呈現，一如受到善待或虐待的巨型動物之境況（柏拉圖在《理想國》一書中對人類的比喻），如果人群永遠啞口無言呢？

根據傅柯分析，被統治者猶如沈默與無主體性的群體，群體並非「裸命」(vie nue)，而是「動物生命」(vie bête)——變形、完全質變以利於某種戲劇性的變化——我認為很難解釋那些以接收或再顯現基督教牧民形式而產生的權力形式。說到底，權力行使宛如一個主體性、一個語言通路**走向群體**，就變成了羊群的屬性。一旦基督教牧民的仙女棒一點，就將這個由來久遠的，來自久遠東方文明的權力型態，改頭換面現形出來了。這個隱喻出現嚴重的矛盾：如果我們跟著傅柯一路探討，跟著他進入了「整體與個體的關係」，在其中，個體與他的精神導師建立了「個人的順服之連繫」，完全的服從，將達到話語境地並成爲主體。事實上，基督教牧民的個體化形式假設牧羊人（神甫）不以引導爲樂，並編定了一些外在規範形式，使他進入了主體性的空間——他要「知道群體中每個成員靈魂深處的奧秘」。爲了使這個引導羊群的新「潘」(Pan)³能安頓下來，必須理解這些主體性（慾望、情感、思維、安排），一些敘述也能由這些主體自己安排配置。

這個轉折的樞紐即爲天主教會所實施的雙重部署：良心的考驗與良心的終極目的——伴隨著這個樞紐的抒發就是告解。坦言不諱，將中心安置在主體化的部署，如此這樣的一種呈現話語的部署，群體於焉浮現，權力也透過各式各樣的告解，得以行使。如此獨一無二的部署既偉大又恐怖，在人類文明史中找不到與之對等比擬的了，群體

3 譯註：希臘神話中的畜牧神。

不僅通向論述與變化多端的主體性形式——群體進入了一個「遊戲」空間，傅柯說，權力的機器完全建立了：一個「奇怪的遊戲，其中的諸多要素都是生命，死亡、真實、遵從、個體們、身分認同」。一個奇怪的組合將在牧民的基本先決條件中產生——群體是爲了被引導而存在的，由此觀之，其被管理的意向（服從與順從）是屬於他的本質了——基督教牧民，其特性是在引導者與被引導者的關係中，開闢了一個自反性(réflexivité)的空間以及一個交流的場所。一個「灰色地帶」建立於想要在最佳條件與牧民結構下帶領羊群者——最主要的性質是上帝或人類的帶領者與被「帶領」的人類或動物，兩者之間強烈的不對稱關係——而從群體走向一種自反形式，尤其是道德自反。如果不脫離牧民條件的話，將使各種的偏移運動成爲可能。

傅柯的觀點是，在「使其活命」與「令其死亡」兩極之間模糊難以辨識的狀態，建構了我們所稱爲西方現代權力的特殊點——權力的行使從這個特殊點出發，權力「出現」在互相對立的形式：出現在帶領人群走向崩毀與滅絕的巨型災難現象，權力的型態同樣也出現在提升「主體」，達到具有自反性的境況，以拔除由來久遠以致無法憶起的那種無法自主的他律(hétéronomie)。

很明顯地，我們點到了要害，這種不確定的境況或不明確的部分，後者即爲當代生命政治的真義。事實上接近柏拉圖在《論政治》文本中關於皇家織布工人所揭示的例子：由一名千面的神甫人員負責協調、融合（如同一種國家或社會生活中內在的「神」），人群生命中所有可能的與可想像的面貌。顯而易見地，我們所處的社會，生命的濟助供養，不是各種差異與不同專業間各自獨立行動，也非爲了自身的目的而行動所形成的合作關係，而是一個總體的機制，融合且具差異性。誠如傅柯在《知識的意志》中，針對嫁接的社群的古典或理想至高權力，或在其成員所分享的價值哲學上所表述，現代社會中這個生命政治、生命權力的形式，是在成員所分享的價值哲學上之古典統治權或嫁接的社群之理想，壓抑或由多種條件決定已被納入傳統的權力型態。因此，空前未有地，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顯現出如同已經被編入的巨大牧民型態，迫使有關健康衛生與安全的問題

(針對身體的免疫與保健等問題) 成為現代政府治理人群的主要施政目標，而減低了古典政治生活將衝突制度化的形式，但並非不具作用。今日統治者語彙中大量增生了治安與醫學的影像，是另一種由多種條件決定的指標，是所有合理性與所有政治的部署，再加上其他為適應遲來的現代性之牧民型態的權力部署。

當代的牧民矛盾則是：越是加緊腳步跟隨著全球化、「融入」其運轉，就越是出現更多另一端的「脫逃」。如果我們對傅柯的假設保持忠誠的話，那麼應可理解基督教義就是從這裡穿過主體進入了多種權力關係的空間，他們（主體）與權力的關係建構過程中，留下一片擦拭不去的印記。告解的部署正如在順服與建構一個「真正的空間」（內在質疑條件下的行動，如跨出自由的預備動作），在兩者之間建立一種幾乎難以察覺的關係。在當代生命政治的空間裡，也將以同樣的方式，使這個捉摸不定的循環成形：總體牧民越是擴展其支配版圖，改善支配技術並使其多樣化，就越減少「客體化」群體的進程；同時，也減少了对群體的管理。來自不具名引導者的訊息越是繁多、越是差異，就會巨幅減少了追溯既往的機會。我們可以發現牧民管理出現在對立的陣營中，並形成了推論的空間。假設如良心的考驗與告解開放給有能力推論的基督教徒一個空間，正如同當代的生命政治中的紀律規範化已不足夠了——總是以擴充的方式進行，良好的生命政治「統治」會提醒辨識被管理的主體，呼籲他們的責任感，召喚他們規劃未來的能力。從今以後，治理上對紀律的要求與布置，會少過對安全機制的部署與尋找贊同。

當「被管理」者都被提升為主體（要不，嚴格講是被制度化了），有些空間開放了，這些「脫逃之線」持續顯現，脫離了牧民權力的首要條件。而在這些空間裡，被管理者的推論能力受到召喚，與其要舉雙手贊成，他們寧可起而反抗；與其去「理解」對他們所作的種種「說明解釋」，他們創造了自己的理由論據；與其成群結隊行走，他們自行作鳥獸散。況且，根本無需進入公開抵抗的境地，就變成了無法治理(*ingouvernable*)。由此觀之，政治回到從前，復古至最「古典」的型態——這種分裂的狀態已經從政治的高層降下並表露在公共場地——而且其核心處為生命政治的型態——這是我們社會上最

常見的現象：不久前，南韓才選上了保守色彩鮮明的新總統，然而一旦大幅開放美國牛肉進口，數萬南韓民衆就毫不遲疑地立刻上街頭示威，抗議政治高層罔顧公共健康與衛生當局的意見。

然而，和災難的論述相反，幾乎每天都有「政治已死」的宣告，這類的宣告純粹是爲了大量生產以「馴養」爲目的的科技用以馴化與奴化人類群體。因此，得作大限度的翻轉。這樣的翻轉，極可能來自於察覺到這種表面上如此粗暴，如此簡易化，傅柯將這種簡易化所作的定義，我們可稱爲「基本的牧民」。在〈集體中的個別性〉或《規訓與懲罰》的文本中，傅柯闡述神甫人員與信徒之間極端不對稱的關係，這種在引導者與被引導者本質上絕對的不均衡與差異，在所有的牧民型態中，所有的牧民權力與所有的「細緻」權力行使中，周而復始，永無止盡。這些都是構造的要素，不同於留下的痕跡與後遺症。由此觀之，我們有必要記得，和柏拉圖所敘述的相反，人類境況與動物境況的異質性，甚至應該說在這一點上，人類的身分（性質）以及人類欠缺動物性質是恆定的。在所有牧民的型態中，無論遠古、現代或當代，人類的性質是完全集中在引導者這一邊。然而如果說無論被引導者是動物還是人類，兩者畢竟差別不大的話，那很明確是因爲在牧民關係本身裡，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將人群引導至動物性，至「動物生命」（再次強調，和鄂蘭〔Hanna Arendt〕所言相反，再經阿岡本〔Giorgio Agamben〕提出的「裸命」）。「這些事情」，我們可以採用任何方式命名，而最簡單與明瞭的命名，無疑是包含著能喚起牧民型態，是絕對排除所有原則或介於引導者與被引導者之間的所有擴大進程；這是爲了在所有環境管理知識，完全和作爲被引導的知識是異質的：引導者處於被引導者這一方的知識與理解，以便被引導者可以成爲——**可引導的**。當代「治理」的政客語彙中，以其身分上極端的差異，介於引導者假設的才智與被引導者被假設的才智，後者是顯現在前者所入侵而來的論述中，這種論述是採用**教學法**的範例：人類群體是個課業落後且散漫的班級（校園用語）因此必須以簡潔的語彙，不斷的解釋，使之明瞭而爲**可引導的**。在被引導者所獲得的知識裡，他們從來不知道要與神甫地位相等，這是千萬要不得的；而在警察社會裡，這也是很明顯不被期待的。「政治」的教學法：一個智慧的管

理群體包含節制必要的知識與資訊數量，以致他們能夠被管理。我再度強調，從醫學方面得來的印象是非常具有說服力：醫生只向病人說明可促使病人接受治療的一些重點，且避免向病患上一堂醫學院的課程。再談到2008年10月撼動全球的金融危機，政治高層盡其所能地僅向大眾提供「有用」且簡潔的資訊，與其誠實說明真相，不如設法安撫社會民心。對引導者而言，召喚被引導者陣營，讓其持續具有動物才智的辨識與判斷能力。這些動物具有聰明才智，一方面我們稱之為「動物生命」，換句話說，基本上，生命只有在牧民境況下，只有在被引導境況下，才能具有型態。

在本文開頭所提到的，我認為傅柯的某種因素疏忽而造成的差錯，可能是他在哲學上的盲點，換句話說，即是他經常陳述完全顛倒的意見：由此情況觀之，傅柯的觀點使我們憶起，現代的生命政治是建立在長期以來人類群體與動物群體之間無區別的基本境況。

自從人家試圖說服我們——作為生物，動物的生命權通道並沒有比我們少——我們就開始有點懷疑了。自從所有政治人物們所關注的重心最終走到保護並提升人們生活品質的那一刻起，現代牧民不可言明的特點，便強勢返回了：只有生活在牧民社會裡的人們才能得到保障。在永遠變化無常的定義中，群體，首先就是活著的材料與型態。